

粟特人在于阗

——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

毕 波

[摘要]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13件粟特语文书，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粟特语文书。这组粟特语文书年代可能为8世纪末，内容包括经济文书、书信等，是研究这一时期在塔里木盆地于阗王国活动的中亚粟特胡人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其中的经济文书和内容最长的一封信，考察了粟特人在于阗王国及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和商业网络、粟特人与于阗社会汉人、于阗人和犹太人等群体的互动，以及这些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等问题，由此揭示出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粟特人在沟通不同地区之间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古于阗社会多元文化汇融的现实。

[关键词] 粟特语文书；于阗（和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粟特人(Sogdian)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Transoxiana)、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一个古代民族，汉文史籍称其为粟特胡、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有时又以商胡、贾胡、兴(生)胡名之，后者是因为汉人眼中的粟特人多以经商立身。从公元3世纪到9世纪，继贵霜商人而起的粟特人活跃于从粟特本土到中国以及周边的广大区域，成为亚洲内陆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其卓越的商业能力正是他们于北朝末年在中国北方崛起的重要原因。^①不止于此，粟特人还在促进不同政权之间政治沟通、跨地域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前来中国的粟特人在从西域到中原的丝路沿线重要城镇建立起一系列商业、移民聚落。敦煌、吐鲁番等地因而留下一些反映他们在中国贸易、生活情况的粟特语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因(Aurel Stein)1907年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8封用粟特文书写的信，学界一般称作“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以下简称“古信札”)。这组信写于西晋末年(313年左右)，是在中国经商、生活的粟特人寄给他们远在故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商业伙伴或亲友的信^③，是了解粟特商人在中国早期商业、

作者：毕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biboguoxue@ruc.edu.cn。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阶段性成果。感谢孟宪实教授及诸位评审专家提出修订意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提供的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在此谨表诚挚谢意。文责自负。

① Bi Bo. “The New Bilingual Sogdian and Chinese Epitaph from Yeh and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Ch’i Dynasty”. *Acta Asiatica* 119, 2020, pp. 67-89.

② 相关参考文献参见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3，10(2)。

③ 这组文献的刊布和研究概况，可参见毕波、辛维廉：《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载《文献》，2020(3)。

移民活动最为重要的一组材料。然而,包括古信札在内的诸多粟特语文献,是20世纪初英、法、俄、德、日等国探险队在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时所获,时至今日仍收藏在这些国家,留在国内的数量不多。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今,中国境内虽然也不断有粟特语文献发现,但多是零星发现的文书残片、墓志塔铭、金银器铭文等。所幸21世纪初在新疆和田地区(古代于阗)发现了一批粟特语材料,分别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以下简称人大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①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②,成为深入考察粟特人在于阗活动的宝贵一手资料。

一、人大藏粟特语文书简介

人大藏这批新发现粟特语文书是2010年春入藏的,共13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文书所含历史信息来说,可谓近年来关于粟特人最重要的一组发现。这批纸文书,其中4件为经济文书,6件为书信(仅1件比较完整),其余3件因残损严重、难以识别,性质待定。笔者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辛维廉(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受委托整理这批文书,释读工作业已完成,成果分别以中英文论文形式于2011—2017年间在国内外发表。^③文章发表后,有学者针对释读内容提出一些修订意见,为方便国内外学界利用这批文书,我们采纳合理意见对释读进行了修订,并附上词汇表及所有文书的彩色图版,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为题于201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将结合本人已经完成以及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工作,对这组文书的重要价值予以说明。关于文书年代,唯一相关的线索是文书12背面的汉文纪年“□□六年闰二月[十] [”],通过分析此纪年信息,并结合人大藏和田汉文文书中不少有纪年文书属8世纪下半叶的唐代大历、建中及贞元时期,我们认为这组文书可能写于8世纪末左右,即唐帝国在于阗统治的尾声。^④此外,与这组文书关系密切的两封791年左右的犹太-波斯语书信^⑤,也可支持这一定年。

虽然这组文书的具体出土地点尚不清楚,但和田麻札塔格、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等地发现的

① 国图所藏为一张带有泥封的粟特语纸质签条,附于一份7世纪下半的于阗语账目上。账目由段晴教授释读研究:《粟特商队到于阗——BH4-135之于阗文书的解读》,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96-115页,科学出版社,2016;粟特语签条(BH4-136)由吉田豊教授据照片代为解读,作为附录二刊于段文115页,根据新照片修订的释读参见吉田豊:《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グド商人?》,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时代》,284-285页,汲古书院,2017。

② 仅一件粟特语小残片,由张湛解读,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96页,中华书局,2013。

③ Bi Bo and N. Sims-Williams, “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I: Four Economic Docum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0, 130 (4): 497-508; “Sogdian Documents from Khotan, II: Letters and Miscellaneous Frag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5, 135 (2): 261-282; 毕波、辛维廉:《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四件经济文书》,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0辑,187-20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毕波、辛维廉:《和田出土粟特语文献中的书信及其他残片》,载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年华诞祝寿文集》,306-325页,中西书局,2017。

④ 详见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3、43-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据主持整理人大藏于阗语文书的段晴教授介绍,其年代也多在8世纪晚期。

⑤ 一封是20世纪初斯坦因发现的,现藏英国图书馆,释读参看 Bo Utas, “The Jewish-Persian Fragment from Dandān-Uiliq” (原载 *Orientalia Suecana* 17, 1968, pp. 123-136), “The Jewish-Persian Fragment from Dandān-Uiliq Revisited”. In C. Jahani and M. Fallahzadeh (eds.), *From Old to New Persian: Collected Essays*,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2013, pp. 25-41。另一封百年后发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释读研究及修订版参见张湛、时光:《一件新发现犹太波斯语信札的断代与释读》,载季羨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7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绸之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661-672页,年代考订见667-668页,科学出版社,2016。

粟特语、于阗语、汉语、古藏语等文献表明^①，曾经有不少粟特人在这些地点活动，有学者甚至倾向于认为于阗当时有“粟特村”存在^②，因此，这组新获粟特语文献有可能也不出这些地点。

人大藏粟特语文书数量并不算多，且没有一件完整无缺，尽管如此，这组文书对于粟特研究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在历史研究层面它们为考察粟特人当时在于阗的商业活动、与于阗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互动、他们的宗教信仰，乃至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等都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主要就从这几方面来加以说明。

二、人大藏粟特语文书所见粟特人的商业活动

粟特人在于阗语文献中被称作 *sālī*，该词后来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这不仅说明在于阗的粟特人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③，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于于阗社会日常经济生活的嵌入程度之深。不过，此前对于于阗粟特人的考察主要依据于阗语、汉语材料，其中反映的多是粟特人在当地进行的放钱、缴物、代官方征税之类的经济活动。^④与之不同，人大藏粟特语文书则更多地为我们呈现出其商业贸易的一面。

（一）8世纪粟特人在于阗的商业活动

国图藏粟特语签条上出现的 *srt p'w* “商队首领、萨保（宝）”表明^⑤，7世纪后半在于阗的粟特商人，延续着4世纪初古信札时代以来以商队形式组织商业活动的传统，到8世纪时情况亦应如此。至于贸易的商品，从古信札时代起，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远距离、跨区域贸易的粟特人，主要选择香药、织物类体积小、重量轻、却又价值高的奢侈品，对于酒、小麦之类当时不便陆路长途运输的商品，只要有市场需求，有利可图，粟特人也会涉足，但应该是局限于短距离范围内。^⑥这种贸易商品的选择策略，贯穿于此后几百年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活动。那么，到8世纪末时又是怎样的呢？

人大藏粟特语文书中有4件经济文书，3件都是四、五行长的内容较简单的清单类文书，对了解粟特人在于阗的经济活动帮助不大，商业信息最为丰富的是一件正背两面书写的残文书（文书4），主要内容是对“縠布（棉布）”（粟特语 *wyš'yny* 或 *wyšyny*）交易情况的记录。^⑦由于文书残

① 相关参考文献参看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序言”，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此处补充一条：Zhang Zhan. “Sogdians in Khotan”. *The Silk Road*, 2018 (16): 30-43.

② 于阗语文献中的 *sālī bi ša* “粟特村”，表明当地存在粟特聚落。类似表述 *βουσογλιγο* (Bun-suglig) “粟特聚落”见于一件7世纪末大夏语文献，卢湃沙 (Pavel Lurje) 最先正确理解了该词意思 (N. Sims-Williams. *Bactrian Personal Names*. Vienna, 2010, p. 87)。吉田豊经荣新江提醒注意到于阗语文献，并将其与大夏语材料联系起来，以说明粟特聚落广泛存在，参见 Y. Yoshida. “Review of N. Sims-Williams,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 (Revised Edition) and I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13, 76 (1): 158.

③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19-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11-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Zhang Zhan. “Sogdians in Khotan”. *The Silk Road*, 2018 (16): 31.

④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20-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Zhang Zhan. “Sogdians in Khotan”. *The Silk Road*, 2018 (16).

⑤ 吉田豊：《コートンのユグヤ・ソグド商人？》，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时代》，285页，汲古书院，2017。

⑥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In A. Cadonna and L. Lanciotti (eds.),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Florence, 1996, pp. 45-67；增订本汉译参见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撰，毕波译：《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É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Brill, 2005；香药贸易参见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3, 10 (2)。粟特人贸易商品的最新综述，参见 Y. Yoshida. “The Sogdian Merchant Network”.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Published online: 2021-05-26,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77727.013.491>.

⑦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1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缺,交易记录并不完整,无法做更深入分析。从现存交易记录来看,每笔交易的金额并不是很大(少则四、五百文,多则千余文)。粟特人交易的棉布有可能是来自粟特本土,也有可能是于阗当地出产,因为到8世纪下半叶,棉花这一源自印度的经济作物已经在于阗普遍种植,棉布纺织生产也已具备一定规模^①,因此价格并不特别昂贵,是可以普遍消费的商品。粟特人涉足于阗的棉布交易,应该是和棉布成为当地日常消费织物而导致需求量较大有密切关系。

文书4背面的交易记录最后一节,内容有缺,不清楚所涉是否仍为棉布,结尾部分则提到了一种叫 *ywxth* 的贸易物品,我们此前根据吉田豊教授建议释为“红宝石”(ruby)^②,这应该就是见于早期穆斯林著作中的 *yāqūt* 宝石(元代译作“鴉忽”)^③。在中古阿拉伯语文献中,*yāqūt* 并非特指某一种宝石,而是泛指,是一类以其无与伦比的硬度为主要特征的不同颜色的多种石头的属名,按现代宝石学分类为刚玉(*corundum*),与珍珠、祖母绿(*emerald*)同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最受喜爱的宝石;文献中依颜色将其分为四类:红、蓝、白、黄,在中古阿拉伯世界,最为贵重者为红宝石;至于刚玉的产地,几乎所有的阿拉伯文献都指出是印度、锡兰(斯里兰卡),此外还有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ān*)^④。粟特语文书此处提到的 *ywxth* 有4枚,所涉钱额处有残损,不好辨识,目前释读为400文(应该是指唐朝铜钱),粟特人所言 *ywxth* 是红宝石还是蓝宝石(抑或是和吐鲁番出土7世纪“称价钱”帐上粟特人买卖的“香”一样是泛指),又是来自何方,此处暂不讨论,但4枚宝石仅值区区400文,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当然,也可能所涉钱额有误,毕竟此处有明显残损。尽管存疑,作为奢侈品的产自域外的高品质珠宝长期位列粟特人在东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则无可置疑。^⑤

在一份类似“抄”的文书(文书1)中出现了可能是“毡匠”(*nmtkr'y*)的词汇。^⑥上引国图藏粟特语签条所附于阗语账目上,记录了大宗“毡毯”交易^⑦,有可能表明7世纪下半在于阗的粟特商队经营毡毯和账目上所列某些物品。“毡匠”的存在表明毡毯应该有在于阗当地制作的,也不排除有来自粟特本土或其他地方的可能。粟特地区穆格山(Mount Mug)发现的一封8世纪早期的粟特语书信中,提到了一种特别的毡毯(*rm'nykh*),据研究和9世纪上半编纂的梵藏词典《翻译名义大集》(*Mahāvvyutpatti*)中出现的藏文名物“长地毯、盖毯”同为一物,表明这种粟特毡毯很有可能当时曾被传入吐蕃地区。^⑧据稍晚时期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粟特地区诸城中布哈

① 和田古代的棉布及粟特人此一时期的棉布交易,参见毕波:《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白氍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3);毕波:《粟特人在焉耆》,载《西域研究》,2020(1)。

② 参见吉田豊:《于阗的粟特人——对和田出土的两件犹太波斯语信札的一些新见解》,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626页,科学出版社,2016;Y. Yoshida.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wo Judeo-Persian Letters from Khotan”. In A. Hintze, D. Durkin-Meisterernst, and C. Naumann (eds.). *A Thousand Judgements: Festschrift for Maria Macuch*. Harrassowitz Verlag, 2019, p. 392.

③ 参见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143-157页,凤凰出版社,2019。

④ Z. Amar and E. Lev. “Most-Cherished Gemstones in the Medieval Arab Worl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7, 27(3): 391-394;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147-148页,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

⑤ 粟特人从事珠宝贸易的最早确证见于北齐时期,参见Bi Bo. “The New Bilingual Sogdian and Chinese Epitaph from Yeh and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Ch'i Dynasty”. *Acta Asiatica*, 2020(119): 74-76.

⑥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⑦ 段晴:《粟特商队到于阗》,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108页,科学出版社,2016。

⑧ A. Begmatov. “Commodity Terms in the Languages of Central Asia: New Interpretations from Mugh Document A-1”. *Studia Iranica*, 2019(48): 17-18.

拉出产的毯类比较有名，经常远销其他地区^①，《新唐书》则记粟特地区东安国国王开元年间遣使唐朝所献诸物中有“拂林绣氍毹”（“毹”当为“毯”，拂林即拜占庭）^②，因此，也不排除这一时期有产自粟特本土或来自他处的高端毡毯被粟特人贩运至于阗和西域其他绿洲乃至更东地区^③。

尽管人大藏文书所见贸易信息有限，但从中不难看出，8世纪末在于阗的粟特商人贸易的商品较之此前已有明显变化，除传统的奢侈品之外，包括棉布在内的日常用品也成为他们主要经营的商品。依靠这些不同商品大大小小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粟特人积聚的财富之多远超我们的想象——文书4背面另有两行单独书写的文字（与其他文字方向颠倒），提到他们可以用数额高达1000贯（=100万文，参看下文“贯”）的一笔钱去做善事。^④不论这笔巨额资产与上文所言棉布或宝石交易是否直接相关，这些在于阗的粟特商人经济实力之雄厚由此可窥一斑，这除了与商人个人的能力有关外，应该也和其背后支撑的庞大的粟特商业网络密切相关。

（二）8世纪末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网络

从4世纪初进入中国贸易的初期开始，粟特人在北方丝路沿线重要城镇建立起一系列商业、移民聚落，这些城镇既是他们在异乡的家园所在，也是其贸易商品的集散中心以及连接其贸易终端的中转站，粟特人对于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一些商品的贸易达到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即得益于其分散各地的聚落所构建的强大商业网络。^⑤对于考察8世纪末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网络，人大所藏粟特语文书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文书中内容最长、最具研究旨趣的是一封32行长的涉及到商业活动的信函（文书5），写信人叫得悉槃陀（Takhsich-vande），从信文内容判断，应该是收信人的商业代理人。信未具地址，收发地点未有明示，但信文第17—18行提到“我去了拨换，寄书一封与您，我是从拨换寄出的信”，由此判断信是从拨换寄出的^⑥。拨换（Parwan，今阿克苏）位于西域北道中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安西入西域道”^⑦下记有拨换南通于阗之路线及距离，同时还记有拨换东达（龟兹），西往疏勒，西北经碎叶抵怛罗斯的路线及距离^⑧，由此可见它

① M. S. Asimov and C. E. Bosworth (ed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V: *The Age of Achievement: A. D. 750 to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1: The Histor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etting, UNESCO, 1998, p. 84, p. 386; M. S. 阿西莫夫、C. E. 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4卷（上）《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修订版）》，69、379页，中译出版社，2017；É.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Brill, 2005, pp. 300-301.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下《西域传下》，6245页，中华书局，1975。

③ 文书提示有粟特“毡匠”在于阗活动，表明除了商品流动外，也可能存在相关人员和技术在粟特和西域之间的流动。

④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⑤ 毕波：《粟特人与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香药贸易》，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3，10（2）。

⑥ 张湛也认为该信寄自拨换，参见 Zhang Zhan. “Sogdians in Khotan”. *The Silk Road*, 2018（16）：38。吉田豊指出，上文提及的犹太-波斯语书信中的一封也提到了拨换，而我们在释读该信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参看吉田豊：《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グド商人？》，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時代》，276、284页，汲古书院，2017。Y. Yoshida.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wo Judeo-Persian Letters from Khotan”. In A. Hintze, D. Durkin-Meisterernst, and C. Naumann (eds.). *A Thousand Judgements: Festschrift for Maria Macuch*. Harrassowitz Verlag, 2019, p. 386.

⑦ 贾耽《皇华四达记》所依据的材料，应当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书档案，其中所涉地点都是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可直接到达的地域，也是唐朝在西域地区开通道路、设置馆驿的结果，参看荣新江：《汉唐文献对“丝绸之路”的记载》，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5辑，6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⑧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安西入西域道”条，1149-1150页，中华书局，1975。拨换通于阗原文如下：“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吉田豊已援引这条史料说明拨换位于当时的交通要道上（《コータンのユダヤ・ソグド商人？》，276页，载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世界とその時代》，东京，汲古书院，2017）。引文中拨换经神山达于阗的道路，也为和田发现汉文文书所印证，如一件德国藏文书中列出了神山以北四所馆驿的名称，而人大藏一件文书则提到了“昆岗”，参见荣新江：《唐代于阗史新探——和田新发现的汉文文书研究概说》，载吕绍理、周惠民主编：《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49页，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

是北道上一个交通枢纽。该信若寄自拨换，则发现地点于阗当为收信人所在地。

整封信最关键部分是第8—17行，讲了收信人对他的横加指责及他自己的辩驳，内容如下：

但您是……不公正的，因为迄今您还在指责(?)我这个(您的)微不足道的奴仆(说)：“得悉槃陀夺走了我的利益(?)。”我没有向您索要本金或商品(?)，但您自己却莫须有中伤我。现在我已经破产，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我没有去粟特，也没有去突厥之地或是吐蕃之地。(至于)您的货物，无论我从何处带给(您)利润(?)，您的货物的大(部分)已经不在(?) (我?)手里了，而是被运往了长安和回鹘，以及突厥之地，还有粟特，对您而言(?)已经毫无利润(?)可言了。至于我这里，无论还有什么货，对您而言(?)还有些利润可得(?)。

这一段辩解之词提到了几个地理名词：粟特(*sywδ*)、突厥之地(*twrkstn*)、吐蕃之地(*tw-pytstn*)、长安(*xwmt'n*)以及回鹘(*x'yγwr*)。“粟特”应该就是中亚粟特本土；“突厥之地”，音译作“突厥斯坦(Turkistan)”，很可能是指河中地以东的七河流域(Semirech'e)^①；“吐蕃之地”应该是指吐蕃控制下的青藏高原；“回鹘”则应是指回鹘治下的漠北蒙古高原^②。若此理解不误，这样的表述可能也从侧面揭示了该文书的年代应是唐朝统治西域的末期——8世纪末，当时吐蕃尚未取代唐朝统治于阗，回鹘的统治中心还在漠北。即便年代稍有偏差，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地理名词无意中勾勒出粟特人当时在东方的商业网络图景。这一网络涵盖了从中亚到中国的广阔区域，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东至唐都长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鹘腹地的蒙古高原。对比古信札时代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范围——主要沿塔里木盆地(尤其南缘)—河西走廊—长安、洛阳一线展开^③，即可看出，至该信所反映的8世纪末左右，经过四百余年开拓发展，粟特人的商业网络扩张成果显著，尤其是对河西走廊至中原这一线以南的青藏高原和以北的蒙古高原的先后开拓，成为构建粟特人在东方的商业帝国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相继占领陇右和河西，切断了唐朝与河西西部、西域往来的重要通道，战争与局势不稳本应对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有所冲击，但该信文显示，8世纪末前后，不仅粟特人从西域到长安的贸易往来似乎处于正常状态，与回鹘、吐蕃的商业网络亦正常运作。^④如若考虑到以下情况：9世纪中叶之后粟特人在吐蕃的贸易让位给大食和犹太商人^⑤，在中原、回鹘的贸易网络在9至11世纪期间已逐渐转化为由回鹘人主导^⑥，那么，该信所呈现的8世纪末左右粟特人的商业网络，可能代表了他们在东方商业势力的顶峰阶段。和长安、粟特等地一样，有粟特商队、聚落存在的于阗、拨换，很长时期内都是支撑起这一商业网络的重要节点。

至于这一时期粟特商业网络的主体到底是哪种背景的粟特人，仅从人大藏文书看，很难看出端

①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20、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吉田豊：《貨幣の銘文に反映されたチュルク族によるソグド支配》，载《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2018(57)。

② 参见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③ 古信札中出现的地点图示，参见É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Brill, 2005, p. 59, map 3; N. Sims-Williams. "Ancient Letters". *Encyclopædia Iranica*, II/1, pp. 7—9, Figure 1,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ancient-letters> (2012—12—30)。

④ 吉田豊教授指出安史之乱后粟特人从事的丝绸之路贸易急剧衰减，但此信所提这些地点表明他们仍然维持着其国际贸易，粟特人此后在吐蕃和回鹘地区的商业活动也仍在发展，参见Y. Yoshida. "The Sogdian Merchant Network". Published online: 2021—05—26,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77727.013.491>。粟特人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商业网络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笔者将于另文专论。

⑤ 沈琛：《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载《中国藏学》，2020(1)。

⑥ É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Brill, 2005, pp. 322—326; 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126—1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倪，但若结合 9 至 11 世纪敦煌、吐鲁番乃至拉达克（Ladakh）等地发现的粟特语文书、岩刻铭文、景教十字等文献文物来考察，略可发现以下变化：由于中国和中亚政治形势的变迁，支撑起粟特人从中原到西域、中亚商业网络的，似乎不再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即祆教）或佛教的粟特人群体，而是逐渐转换为粟特基督教（景教）徒和摩尼教徒这两个群体，借助这两种宗教当时在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沿线建立的庞大网络，在 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导致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受到很大冲击后，其商业网络仍得以延续一两百年乃至唐朝覆灭之后^①，并为后来回鹘人的贸易兴盛奠定坚实基础，而 8 世纪末应该就是这一新旧网络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再来看人大藏粟特语文书 3、文书 4 中分别出现的“长老”“[以]上帝之名”这类明显带有宗教意味的表述，比起有学者认为的从犹太教徒背景来理解，我们仍然坚持当初的看法，倾向于认为这些在于阗和西域从事商业活动的粟特人更有可能是基督教徒。^②就此而言，人大藏粟特语文书为研究此一时期粟特商业网络掀开序幕一角。

跨区域的商业网络得以维持和运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身处不同地点的商人或商业团体可以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而进行交流沟通，在前现代社会，这种交流主要依靠书信这一纸媒。书信是商业网络得以运作维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商业网络本身又是书信得以传递的重要渠道和保障。对此，无论是敦煌发现的 4 世纪初的古信札，还是和田发现的 8 世纪末的粟特语书信和犹太-波斯语书信，抑或埃及开罗犹太藏经房（Cairo Geniza）保存的约 11—13 世纪的犹太商人留下的上千封书信^③，皆为明证。粟特人所留书信这一物质载体，不仅是考察粟特乃至中亚古代书信写作与实践的重要标本^④，也是打开一个丰富多彩的“商人的世界”（The Traders' World）^⑤的窗口，由此可观察他们相互之间信任（多以宗教、血缘为纽带）的构建与维持、情感的交流与传递，更为重要的是，发现诸多赖以重构他们曾经辉煌的商业世界的信息：贸易的组织和开展、商品的选择，等等。就这一层面而言，无论是人大藏书信，还是古信札及其他粟特语商业书信，都有待我们继续深究与探索。

（三）粟特人与于阗社会的其他群体

除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外，人大藏粟特语文书还为理解粟特人与于阗社会的互动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在 8 世纪的于阗经商、生活的外来族群，除粟特人外，还有犹太人。后者的信息，全部来自上文所提两封犹太-波斯语书信^⑥，而这两封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波斯语信中存在不少粟特语因素，

^① 关于摩尼教徒的参与，参见吉田豊：《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所见 10 至 11 世纪的粟特与高昌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Y. Yoshida, "Relationship Between Sogdiana and Turfan During the 10th-11th Centuries as Reflected in Manichaean Sogdian Texts". In Xiao Li (ed.), *Journal of the Silk Roads Studies*, 2017（1）: 113-125；毕波：《粟特人在焉耆》，载《西域研究》，2020（1）。关于景教徒及其活动，参见 Bi Bo, "A Chinese-Sogdian Bronze Seal from Tongwancheng, Jingbian, Shaanxi", 提交“北京论坛（2019）”分论坛“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会议论文。

^② 引文分别参见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9-10、13 页（观点见 1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③ S. D. Goitein 曾拣选其中的 80 封信函予以整理出版：《*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具体分析研究参见：S. D. Goitein and M. Friedman, *India Traders of the Middle Ages: Documents from the Cairo Geniza 'India Book'*. Brill, 2008。

^④ Adam Benkato 最近出版的关于粟特语书信研究的专著中，参见 *Studies on the Sogdian Epistolary Tradition*. Brepols, 2018，人大藏书信即其重要分析素材之一。

^⑤ 参见 S. D. Goitein, *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

^⑥ 信文末说明这些犹太人来自何处，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 9 世纪中叶阿拉伯文献中记载的 Radhanites 犹太商人群体，参见 M. Gil, *Jews in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D. Strassler, Brill, 2004, p. 629；A. King, *Scent from the Garden of Paradise: Musk and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Brill, 2017, pp. 254-255；Radhanites 犹太商人与粟特商人的关系，魏义天有过讨论（É.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Brill, 2005, pp. 184-186）。

比如,有一些借自粟特语的词汇,有些表达方式也明显受到粟特语影响。^①这表明身在于阐的犹太人当时深受粟特人影响,两个外来群体之间关系比较密切,但二者之间究竟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还是既有竞争又相互合作,有待更多新材料发现。和粟特商人一样,这些在于阐的犹太商人也是颇具经济实力,其中一封信中提到他们“为战斗捐了价值100贯(=10万文)的物资”^②,实力似乎不如粟特商人。

在于阐的粟特人和犹太人主要是以商人身份出现,从事商业经济活动使得他们必然要与于阐社会积极互动,最能反映这种互动的是一些日常词汇的借用。人大藏粟特语文书中出现了几例汉语借词,如“长史”“特进”“升”等,涉及官职、称号、度量衡。这一借用的背景当然是7世纪末到8世纪末作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阐有大量汉人镇守军驻扎,于阐社会因而在制度、文化上受到唐朝影响,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不少汉语词汇被当地的于阐人借入他们的于阐语。^③以上所列借入粟特语的“长史”“特进”“升”,同样也被借入于阐语,鉴于相关材料甚少,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汉语借词所反映的,到底是在于阐的粟特人和当地的汉人群体直接交流的结果,还是通过于阐人而间接借入的。

在人大藏粟特语文书出现的汉语借词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上引棉布买卖文书中出现三次的货币单位“贯”(粟特语 *ptkwk*)。与同时期借词一般多为音译词不同,这是一个借自汉语货币量词“贯”的意译词,派生自粟特语动词“贯、穿”。^④众所周知,“贯”是用来计量中原的方孔铜钱的单位,一千文为一贯。不过,于阐的粟特人虽借用了“贯”这一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单位,但用法与当时汉人的习惯用法并不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贯”不仅被借入粟特语,还经由粟特语这一中介,被同在于阐活动的犹太商人所借用(犹太-波斯语作 *ptkw*),这也反映出于阐的粟特商人和犹太商人关系之密切。^⑤最出乎意料的是,它还被借入阿拉伯语 *fakkūj* (*fkkwǰ*)^⑥,出现在一本9世纪中叶的阿拉伯语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Sin wa-t Hind*)讲到中国货币的部分,其中明确指出该词意为1000文铜钱,遗憾的是,该书汉译本根据法文本将其音译为“法库”,最新的英译本也直言词源不明^⑦,显然是长久以来学界都不清楚这一阿拉伯语词汇的源头就在汉语。可以说,若非人大藏粟特语文书的发现,这一谜团何时得解亦未可知。这大约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形,商业贸易的背后,伴随着无声无息的文化交流。

人大藏粟特语文献,尽管数量有限,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是了解活跃在中古于阐社

① 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绸之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668-669页,科学出版社,2016;吉田豊:《于阐的粟特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623-627页,科学出版社,2016;Y. Yoshida.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wo Judeo-Persian Letters from Khotan". In A. Hintze, D. Durkin-Meisterernst, and C. Naumann (eds.). *A Thousand Judgements: Festschrift for Maria Macuch*. Harrassowitz Verlag, 2019, pp. 388-392.

② 张湛:《粟特商人的接班人?——管窥丝绸之路上的伊朗犹太商人》,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下),664、666-667页,科学出版社,2016。

③ 具体分析和更多例证,参见毕波:《和田新发现汉语、胡语文书所见“筋脚”考》,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46-347页,科学出版社,2014。

④ 毕波、辛维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11-13页,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⑤ 毕波:《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我们认为该粟特语词汇借自汉语“贯”,吉田豊教授此前接受这一看法,近期又撰文指出应是借自汉语“缙”(《9世纪东アジアの中世イラン語碑文2件》,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59),2020。对此笔者无法认同,将于另文讨论。

⑥ 吉田豊:《9世纪东アジアの中世イラン語碑文2件》,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20(59)。

⑦ *Two Arabic Travel Books: Abū Zayd al-Sirāfi.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Ed and tr. by T. Mackintosh-Smith; Aḥmad ibn Faḍlān. *Mission to the Volga*. Ed and tr. by J. E. Montgome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7, p. 53, p. 150; 穆根来、汶江、黄倬译:《中国印度见闻录》,15、18页,中华书局,1983。

会的粟特人的贸易活动、商业网络的第一手珍贵文献，还提供了观察唐朝制度和文化在西域绿洲王国的影响的特殊视角，深化了我们对于阗社会不同族群之间交流互动的认识。

Sogdians in Khotan: Centering on the Sogdian Documents in the Renmin University Collection

BI B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acquired by the Renmin University Museum in 2010, thirteen pieces are written in Sogdian. This is a substantial group of Sogdian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These documents include economic texts, letters, and other types of writings, and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shedding great light on the activities of pre-modern Sogdians in the Tarim Basin oasis kingdom of ancient Khota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 few economic documents and a long business lett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ding and commercial networks of the Sogdians in Khotan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This article also studies Sogdian traders'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or instance, the Han Chinese, the Khotanese, and the Jews, and the Sogdian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time.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Sogdians had played in the commercial connec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but also reflects the multicultural life of ancient Khotan societies.

Key words: Sogdian documents; Khotan; Renmin University Museum

(责任编辑 张 静)